

近代民族主义观念驱动下的汉字文化圈分异——知识迁移障碍的形成机制

許喆(釜山大學校 佔畢齋研究所)

[摘要]

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关于“绝对知识”的界定及其变迁，并非历史的偶然，它始终与特定历史时期判断真理与正当性知识的认知基准（Epistemic Standard）密切相关。这一基准线的移动，在近代被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民族主义——所裹挟，最终导致了文化圈内部知识体系的根本性分异和隔阂。

为了剖析这一复杂的历史性转型过程，我们引入结构性的理论工具。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知识从来不是中立的产物，而是与权力装置紧密交织。他提出，每个时代的知识体系皆由特定的“认知型”（épistémè）所奠定，即一个时代内知识生产、分类和传播的底层规则。汉字文化圈经历了从以儒学经典与汉文文献为核心的传统认知型，向以国族语文与西方学术体系为中心的新型知识结构的转型，这便是该理论的鲜明例证。福柯的“认知型”概念，为解析各国如何设定自身新的知识标准并排斥传统或外来的“非知识”或“低等知识”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同时，文化同化理论与“混杂性”（hybridity）概念的结合，揭示了知识转型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遭遇过程，如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语言文字变迁，便是传统汉文、近代民族语言以及西方语言等异质元素混合而成的复合体。此外，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根茎”（Rhizome）理论，则将传统汉文经学体系和近代国家分科制度视为等级森严、中心化的“树状”（Arbor）知识结构，与之相对的根茎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在制度性权力结构之外，非主流知识如何以非线性、偶发性的方式被保留和转化。

在近代以前，汉字与儒学、汉文文献曾是东亚各国构建共享知识系统和政治、

道德、经世体系的共同基石，其作为知识体系的根本认知型在本质上是相对稳定的。然而，西方势力的东渐和帝国主义的扩张，迫使各国在危机中反思以往的全部知识体系。各国遭遇了国家危机：清朝因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1842年8月），朝鲜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1882年5月），日本签订《日美和亲条约》（1854年3月），越南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1862年6月）。这些与西方国家首次建立外交关系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知识转型的外在推力。当时以严复、梁启超、俞吉濬、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亚洲知识精英，普遍认识到西方的强大植根于其制度与学术体系，并主张以实用性的西方近代学术取代传统汉学。在近代时期，这些国家的主张呈现以下共同趋向：

第一、建设近代国家：主张必须引入西方法治和民权概念，建设高效的近代国家，才能维护本国的独立自主，抵御列强的侵略。

第二、批判传统思想：批判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空谈学问和封建等级秩序，主张接受西方的个人自由和平等思想。

第三、改革教育制度：强调应该用科学、法律、经济等对国家富强有实际帮助的实用性西方近代学术来取代对现实无益的八股文或汉学教育。

这一转变的基础是知识习得根本——文字和语言的变化。近代公共教育系统通过言文一致政策和西方分科主义学术体系的引入这两个轴心，迅速瓦解了传统的汉文中心认知型，并将实现国家和工业社会所需人才形象的近代性赋予了课程知识。这种现象并非韩国独有。在整个汉字文化圈内，汉字和汉文的地位变化是从核心教育知识降至边缘教育知识，如今这一位置被新知识所取代，或与其混杂，展现出以新形态发生的变化和生成。当然，各国对此的选择有所不同，正是这种选择的多样性成为了今日中日韩面貌差异的机制。

在此过程中，各国对汉字的使用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和权力选择，实施了言文一致，抛弃了传统学术和世界观，转而追随西方学术、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传统学术则以维护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名义被降格为分科主义知识。简言之，在制度教育体系内部发生了知识权力的变化，同时旧与新、表层与内在相互混杂，产生了

知识选择基准线移动所带来的“综合症现象”，并再次引发了新的变化。

关键在于，这种知识转型的驱动力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它指导了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式重构”，而非彻底放弃。知识精英们对儒学展开了双重处理：第一，功能性降格。他们批判儒学经典为中心的“空疏学问”和“八股取士”制度，否定了儒学作为“绝对知识”和“经世济民”核心体系的地位，将其从知识的核心降格为知识的边缘。第二，民族性保留。他们并未全盘否定儒学，而是将其精神内核——如忠孝、修身、集体伦理——从“宇宙真理”和“天下秩序”中剥离，重新定义为服务于“民族精神”和“道德教养”的工具。儒学因此被重构为民族伦理的一部分，为近代国家在道德和文化层面的认同构建提供基础。这种“批判-保留-重构”的策略，标志着知识权威彻底从汉文儒学体系转移到“富国强兵”所必需的西方科学和国族语文体系。

另外，在知识转型的过程中，各国对语言文字这一知识的媒介载体作出了不同的政治与权力选择。近代公共教育体系通过“言文一致”政策和西方分科主义学术体系的双重作用，迅速将符合民族国家需求的“现代性”知识嵌入教育系统。正是民族主义在语言层面的具象化选择，最终导致了“知识迁移障碍”的结构性形成。

这种差异化是以民族主义为名，寻求文化上的“去汉文化”或“去中国中心化”的直接体现：第一，各国文字基准的差异化。例如，韩国采纳了彻底的“韩文专用”，以强化文化主体性；中国大陆推行了汉字简化方案，服务于全民教育；日本确立了新字体和现代日语作为官方媒介。这些基于民族国家利益而产生的文字基准差异化，直接破坏了汉字作为共同书面语的功能。第二，传统知识的“分科化”降格。传统儒学、历史文献等被重新归类，作为“国学”或“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降格并纳入西方分科知识体系中，失去了在当代学术对话中的核心地位。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知识迁移障碍”的结构性机制。这具体表现为三重障碍：第一，基准障碍的生成。共同的汉文“认知型”被彻底打破，各国在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基于本国语文和翻译习惯，创造了不同的学术术语体系。这种知识本体论上的分歧，使得彼此间的学术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难以企及以往的水平。第二，媒介障碍的固化。韩国的韩文、中国的简化字、日本的新字体，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书面媒介系统。这导致了学术文献的直接阅读和理解困

难，即便是对同一个概念的指涉，也必须经过“再翻译”和“再解释”的复杂过程。

第三，分科障碍的深化。西方分科知识体系的引入和固化，取代了传统的经学-史学-子学分类。各国在大学、研究机构、期刊等制度上的分科化，进一步削弱了跨国间的知识交流，使知识界陷入“各自为政”的局面。

因需求而被选择的知识发生了变化，文字和语言也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基础学术的转变，从而带动了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转变。旧与新、内在与外部的冲突在知识的接受和普及过程中再次被激发。接受与变容、内化与创造以新的生命力向不同的形态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各国选择的政治理论又一次导致了汉字文化圈的分裂。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汉字文化圈国家之间的亲疏关系随着政治利益和立场而变化，甚至达到了难以维持共同汉字文化圈特征的冷淡和互不承认的关系。汉字文化圈的生成与衰退，都与知识的选择紧密相连，而这又与政治权力有着深刻的关联。